

欧洲共产主义 与社会主义

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欧洲共产主义 与社会主义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钟 溪 译

EUROCOMUNISMO Y SOCIALISMO

por

Fernando Claudín

根据马德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1977 年 10 月第三版译出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钟 溪 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12,000 字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200

书号 3001·1838 定价 0.47 元

（只限国内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出版说明

费尔南多·克劳丁在三十年代曾任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后来参加反佛朗哥独裁的斗争，担任过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64年，克劳丁与西共领导发生分歧，被开除出西共。目前，克劳丁担任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创始人）研究会会长。

本书是克劳丁的近著之一。他在书中叙述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及其内容。作为欧洲共产主义产生的背景，著者分析了六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危机，以及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的政治危机，剖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苏联社会出现的问题，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国际共运的分裂，苏共对其它党和国家的干涉等。著者认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意、法、西等国的共产党摆脱苏共的控制，根据本国的情况来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才产生了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所谓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作为实现这一理论的纲领。为了供国内理论界研究、参考，我们特将本书翻译出版。

克劳丁还著有《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是政党危机吗？》、《马克思、恩格斯及1848年革命》等书。

第三版前言

本书第二版在1977年6月发行后不久,由于莫斯科对圣地亚哥·卡里略和欧洲共产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欧洲共产主义问题就成了当今世界的头号新闻。这一事件和其它一些事件使我在这次再版时加写了最后一章。其它章、节未作任何修改。

费尔南多·克劳丁

1977年9月

目 录

第三版前言

一、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抉择.....	1
欧洲共产主义现状	1
危机的性质	5
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政治危机	14
二、欧洲共产主义与莫斯科.....	24
冲突的历史根源.....	24
从1956年到东方的分裂	32
“正常化”是不可能的	37
走向西方的分裂?	46
关键的问题是制度的实质.....	58
三、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63
历史经验	65
欧洲共产主义的反垄断资本主义的战略.....	100
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尝试	111
民主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122
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139
四、朝“西方分裂”迈出的步伐	152

一、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抉择

欧洲共产主义现状

1970年末,在各国报纸的前几个版面上出现了一个新词。这个词就是“欧洲共产主义”。在政治语汇中这个词很快地就红了起来。这个词不是执行欧洲共产主义路线的那些党所发明的,但那些党的领导有保留地接受了这一提法,这主要是指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在1976年6月欧洲共产党柏林会议上曾说:“这个词不恰当,不存在一个欧洲共产主义”。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在柏林会议上也避免提这个词,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却非正式地接受了这个词,贝林格说:“这个词并不是我们发明的,但这个词表明人们对于西欧国家能去探索和解决用新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期望是多么的广泛和深刻。”^①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事实上柏林会议本身就已是欧洲共产主义这个现实很好的证明。

就反对这个新词的合适与否,有两种争论的论点:一点是关于东欧国家的问题。那里的共产党是执政党,它们也属于

^① 见各党公布的在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6月23日至24日)。

欧洲。如果欧洲共产主义不是个贬义词，显然不能包括这些党；另一点是，日本是一个亚洲国家，但力量很强的日本共产党的看法和欧洲共产主义的欧洲共产党的看法又十分相似。

这两种论点有共同之处。事实上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各自国家内想解决一些相似问题而制订的方针。从这一点上看，在共产主义之前再加上欧洲二字是不那么严谨的。但也并不是那么十分不确切，因为，欧洲共产主义方针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在欧洲萌芽的。总之，正象平常对一个新现象的命名那样，约定俗成，欧洲共产主义也正是这样。在欧洲共产党柏林会议之后不久，卡里略在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也开始接受欧洲共产主义一词了。卡里略在报告^①中说：“谁也不否认，在柏林会议上有些人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倾向已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一般的构思，欧洲共产主义使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群众性的共产党在一系列根本性的立场上一致起来了。不管这些党是欧洲的也好，不是欧洲的也好。”

属于这一倾向的有意大利、法国、英国、瑞典、日本等国的共产党。到1976年年底，卡里略对欧洲共产主义的保留好象完全消失了，他还提出了“走向执政的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的公式。^②

欧洲共产主义各党的具体行动中两点十分突出：1. 试图将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情况下的过渡

① 在罗马举行的西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第32页，1976年7月28日至31日西共出版。

② 见1976年12月16日《工人世界报》。

战略结合起来；2. 把这些党同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分开来。继六十年代的“东方分裂”之后，欧洲共产主义已隐现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西方分裂”了。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危机中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①

如果说欧洲共产主义当前声望很高，这不仅是因为它的理论和实践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目前的危机把民主—社会主义的抉择提到了日程上来。特别是在南欧的三个国家中，经济、社会的深刻危机同政治危机（天主教民主党、戴高乐派、佛朗哥主义）结合起来了。在意、法、西三个国家里，大有左翼成为多数和领导力量之势。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这三个国家内，共产党已成为左翼的基本组成部分（例如意大利的情况，即使共产党还不是决定性因素）。这种情况使欧洲共产主义成为一种迫切需要的理论，使它超出欧洲的范围，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

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矛盾的再次爆发，自本世纪以来，欧洲人第三次看到必须对社会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了。第一次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由此爆发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主要的革命结果是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第二次是以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开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危机达到顶点。其主要的革命结果是法西斯强国失败了，并为此后的中国革命和其它反帝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旧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和与苏联邻近的东欧

^① 导致这一总危机的历史过程可见《共产主义运动危机》巴黎 Ruedo Ibérico 出版社 1970 年。

国家内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两次危机中，国际工人运动还都没有条件给资本主义危机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出路。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的革命都是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当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构想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完成的。首先是在古老的沙俄帝国，以后在苏军为打败法西斯军队到过的国家内旧政权又被打碎了，但没有紧跟着就实行工人和人民的民主。只有这种民主才能使劳动群众真正占有生产资料，对生产资料进行革命的改造和越来越多地参与对社会的领导。相反，在推行工业化和提高文化水平的同时，剥夺了劳动者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自由，又产生了一个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新的社会制度。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欧和中欧的工人运动和整个民主力量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以及其它国家陷入法西斯独裁和半法西斯独裁的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战胜了法西斯，工人运动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进行了社会改革，维护了民主（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为争取民主也进行了斗争），工人阶级的组织有所加强。但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框框之内进行的。

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工业国保持了二十年令人惊奇的经济增长和相对的政治稳定。与此同时，“风暴地区”（从1914—1945年基本上还是在欧洲）已转向帝国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区。这是在德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相继出现经济“奇迹”的时期。当时有人说资本主义危机结束了，资本主义有能力实行计划 and 自我调节、工人阶级不可逆转地要加入资本主

义体系,马克思主义已经老朽了。但是从1967年国际货币危机和1968—1969年法国、意大利出现了社会、政治危机起,新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又开始罩上了乌云。法国的“五月风暴”和意大利的“热秋”是一种爆发性的征兆,而绝不是夏日里转眼即逝的暴雨。那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新的全面危机又开始了。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共产主义就是这一危机的产物,并在这一危机中经历着考验。欧洲共产主义所起的作用对其未来有重要的意义。

危机的性质

这次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是社会和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和道德危机。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虽然在大多数场合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但危机的普遍性已经清楚了。在欧洲的拉丁语系国家内(也是欧洲共产主义主要舞台)政治方面的危机即使未占主导地位,也有这种趋势。

在所有西方国家基本的、共同的形势的诸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危机的时间长(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四次结构危机),它是继1948年至1967年(在美国从1940年)经济持续发展之后出现的。

正如前几次危机一样,这次结构危机的根源在于先前的积累方式已经不起作用了,那些起着推动作用的工业(这主要是汽车工业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等)也不行了;劳动的国际分

工已经不行了，资本主义体制的中心和其他边缘的关系已过时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如此)各种经济和政治因素促使剩余价值长期飞速地增长，因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利润率也不断飞速地增长。比如，曼得尔^①就强调了下列这些因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工人运动由于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而处于相对软弱的地位；由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和二十世纪头十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大的移民运动和众多妇女要就业，这就使产业工人的后备军大量地增加了；原料相对价格下降了，固定资产相对消耗也减少了。尽管半自动化有相当的发展，但资本的有机构成中固定资产并没有象想象的那么迅速增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利润率一直很低，现在利润又重新上升了。这种情况有力地促使生产资本进一步地积累，并且对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局部”战争以及各国日益加紧重新武装自己的军事需要刺激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不断的发展；而科技研究的不断发展又转过来推动第三次技术革命。新的技术革命，首先具体表现为半自动化，它改变了所有的工业部门生产过程，也改变了流通领域里的许多部门，这就有力地刺激了投资。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些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因素改变了特点。储备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了，在一系列国家里实现了充分就业。这就打乱了劳动市场的力量对比关系，工人斗

^① 曼得尔《1974年至1976年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萧条》，《政治经济学批判》1976年4月—9月号第24、25页。

争的高涨使得剩余价值率停止上升,开始停顿甚至是下降了。比较起来,原材料价格一直很低,对原材料部门的投资也很少(相对来说,原材料部门投资的利润就比装配部门少),原材料生产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和政治因素结合起来结果反而导致原材料价格猛烈上涨,使投资重新集中于这一“初级”部门。经济持续发展时期一直靠在主导部门投资获取的超额利润又称垄断资本利润为这些部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附加投资,结果反而使这些部门的资本大量过剩,超额利润越来越少。这样两种“平均利润率”(一个是占有超额利润的垄断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另一个是竞争最凶的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即使不相等,也至少是接近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开始衰竭了。相继而来的则是不再建立新的工业部门,而是将以前阶段所试验和引进的技术加以推广和普及。曼得尔判定,所有这一切最终使利润率不断下降,结果只能是资本积累的显著减少和在一个长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在这一结构危机中又出现了 1974 年至 1975 年临时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或倒退。^①这是自 1929 年以来资本主义体系第一次发生的大的生产过剩危机。正象 1929 年的生产过剩危机一样,这次危机是由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极大地减少了投资而造成的(而投资减少又由于平均利润率下降引起的)。1973 年和 1974 年上半年官方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压缩了投资,但通货膨胀的加剧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几年以来各国政府利用通货膨胀为手段来防止利润率下降造成的结果。

长时间的结构危机是这次经济危机的特点。即使在复苏

^① 这次复苏时间很短,但是相反倒退延续时间很长。

时期萧条仍然占据了支配地位。注意到这种情况才能明确欧洲共产主义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基本条件。必须看到，虽然这次危机和以前的危机有共同的特点，但是这次危机与以前的危机也有重要的不同点。

首先，与三十年代不同的是西欧工人阶级以欧洲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力量来对付这次危机。工人阶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反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抵抗斗争的主将之一。在二十五年多的时间内，工人阶级加强了自己的阶级组织，争取到部分的改善和进行了部分的改革，在一系列重要的时机中开展了攻势，特别是在南欧（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南欧诸国中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汇合在一起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实现了充分就业或几乎是充分就业，实现了滑动工资制。这就为工人阶级的需要和认识这些需要提供了一个新的客观基础。此外，在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阶层中还出现了一些类似的现象，例如提出了企业中工人权力的问题。这些问题与现行制度有更大的冲突性。

也就是说，在经济持续发展阶段，欧洲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斗争（也包括不少由改良主义组织领导的斗争）越来越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即资本—劳动之间的关系）无法“合理”地适应资本主义本身合理性的要求。目前，工人运动所争取到的成果、工人阶级新的力量和觉悟极大地限制了资本主义领导中心为克服或缓和结构危机进行干预的活动范围。

第二，这次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危机的另一不同点，是原帝国主义殖民地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和人民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为争取独立和经济发展进行着斗争。二十五年

多以来,美国玩着“非殖民化”的牌,一方面要削弱及控制欧洲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是要为当地的统治阶级提供可能,使它们来对抗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力量。虽然这一策略在一系列国家遭到了失败(如中国、越南、古巴等),但在第三世界的多数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加强了统治权,并得到了帝国的某些让步。和三十年代不同的是这个新的因素(过去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有了人民运动以及处于从属地位的资产阶级,它们对经济和政治进行积极的干预)破坏了帝国主义体系中中心和边缘之间不平等交换的“合理性”,也大大限制了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中心的反危机政策。

第三个区别,这次结构危机与前次危机不同的特点(与前两个因素相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相比是对当前资本主义的补充)是当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大大提高了。新资本主义关于发展与消费的理论认为新资本主义有能力避免更大的危机和实行计划经济。如今这种理论造成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但是这种破灭不应又使我们对它相反的理论寄予幻想。事实上,在七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垄断集团相互交错的关系和跨国公司不管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支配和领导中心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在不断扩大和巩固。这一切使国家可以进行比两次大战之间的时候更有效的干预,以减小矛盾的爆发性,靠通货膨胀与通货收缩相结合的办法维持最薄弱的环节。这样,到目前它就避免发生1929—1933年那样的生产剧烈下降,使失业的规模没有达到那几年的水平。

当然,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指

导中心的干预能力比三十年代大的结果，也是因为工人阶级斗争能力也比三十年代更强大的结果。但是，相对而言，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的高低、干预能力的大小，是以它对付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力量的能力大小来衡量的，所以到目前，资本主义得以避免其经济—社会机器的骤然断裂（但它的前景仍象一个画饼）。它所面临的结构危机的深刻程度和长期性是它无法避免的。它还不能避免平均增长率的下降，也不能阻止失业达到最高点。没有彻底的办法来制止通货膨胀，只能靠“紧缩”政策作为必须的补救办法。当 1975 年下半年开始的复苏在整个形势中刚刚有一点效果时，却又预示了 1977 年的增长率将有新的下降^①。认为是一次严重而无法预料的危机的看法似乎是站不住脚的，认为这是一次还算温和且易于忍受的危机的观点也同样不能成立。另一方面，如果说采取的措施在一个特定的时刻避免了灾难性的不协调，那也是靠延长危机的时间为代价的。

结构性的经济危机是在思想、道德的全面危机或是“价值危机”的环境下发展的。这一危机有其深刻的实际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很难衡量出来。新资本主义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靠工资生活的广泛阶层曾经幻想（尽管要通过工会和政治斗争）资本主义有能力保障充分就业和不断提高购买力。如今这种幻想已经破灭了。不仅如此，而且这一信任危机也影响到统治阶级，影响到其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与这一危机相随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腐败的资本主义制度犹

^① 根据 1976 年 11 月 22 日—23 日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会议的报告。